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红色记忆(3)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档案局(馆) 主编

■ 从容应对险恶局面

延安中共中央得悉重庆、南京和上海等地情况后,周恩来打电报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周恩来还打电报给董必武、王炳南,要他们在上海、南京分别向吴国桢、宋子文等人。

3月1日,董必武找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国桢不肯会见,又找宣铁吾。董必武痛斥:我们中共代表团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为什么下令包围我们。宣铁吾支支吾吾。董必武对他说:我将立即离开上海去南京,联络处其他人员随后离开,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宣铁吾无可奈何答应了。董必武还在联络处四楼对全体人员作了一次报告。他分析形势,对前途作了三种估计:第一种,是把我们将送回延安;第二种,是把我们将软禁,或关进集中营;第三种,把我们将的人一个个抓走,分而治之,使彼此不知死活。他嘱咐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进集中营。当场还给每个人发了两把牙刷、一支牙膏、两件衬衫、一双布鞋,准备坐牢时用。

国民党当局逼着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的消息在上海传开后,群情激愤,还有很多记者赶来采访,但都被特务挡了回去。马寅初、柳亚子闯进联络处拜访董必武,特务威胁说:“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马寅初愤怒地说:“蒋介石把我关那么长时间,无非是再把我关起来,我不怕这一套,我是非进去不可的。”特务只得让他进去了。他们要离开时,特务又刁难。柳亚子说:“我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你们有什么资格限制我的行动。”特务不得不放他们走。中外记者采访,都被特务挡在门外,董必武就叫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陈家康打开窗户,在二楼阳台上和在门外的记者和民众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3月2日,董必武离上海去南京。

■ “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董必武在南京分别找了张治中、邵力子、宋子文和陈诚,还看了司徒雷登,当面谴责国

民党关死和谈大门,监禁中共人员的暴行,并提出:上海联络处的人员不到南京,我就不走。董必武走后,上海联络处只剩下钱之光、刘昂等十三人。钱之光已组织人员把藏在墙壁里的黄金取出,装进新制的布马甲夹层中。3月5日,国民党上海当局派来大批便衣警察押送,从马斯南路到北火车站所经过的街道,都戒备森严。联络处人员当天下午就到了南京。

3月7日,四架美国飞机送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国民党当局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等前来送行。在飞机场,董必武发表了书面谈话,内称:“十年来从未断的国共关系,从此断矣!”“目前虽战火蔓延,中国共产党仍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终必失败,好战分子将自食其果”。董必武将登机时,招手对送行人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他的预言后来被验证。两年后,张治中、邵力子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前往北平作和平谈判,最后还参加了新政协。(盛翼昌)

秘密党员金山

上海解放前夕,与杜月笙有师徒关系的金山,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奉中共中央之命,为争取杜月笙,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 金山其人

金山,原名赵默,1922年到上海,1931年入上海警警学校,1932年二十一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隐蔽战线上的职业革命者,直接接受周恩来、潘汉年的领导。金山具有演员天赋,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左翼剧联,和赵丹等朋友创建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过话剧《娜拉》和《钦差大臣》。1937年金山主演电影《夜半歌声》,又以宋丹萍一角名噪一时,被誉为影剧两界的大明星。抗战期间,金山在大后方的重庆颇为活跃,组建了中国的救亡剧团,因主演《屈原》与扮演婬媚的

张瑞芳相恋、结婚。张瑞芳也是由周恩来单独联系的秘密党员。

■ 参加和平代表团

当时避重就轻的杜月笙对金山青睐有加,主动提出收金山为他的弟子。金山和张瑞芳的婚礼,杜月笙还自告奋勇前来当证婚人。在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后,金山开始与杜月笙密切来往,搜集情报,并争取杜月笙对抗战文艺活动的支持。但金山始终未曾暴露自己的特殊身份。1949年初,南京政府李宗仁求和,先派出以章士钊、邵力子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谈判南北通航、通邮事宜。时任全国航业工业理事长的杜月笙,特派他的关门弟子,曾以接收大员出任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金山,以随员陪同前往。

在西柏坡,金山接受毛泽东委托将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亲笔信转交给李宗仁。同年4月,由李宗仁圈定的张治中等组成的和平谈判代表团赴北平谈判,金山被特聘为顾问。谈判期间,白天他同国民党代表团一起研究谈判提纲,或听取李宗仁的指令,审定谈判对策,晚上则向李克农汇报,使中共代表团处处操纵着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后来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张治中等留在北平,方才知金山竟是中共党员。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方面千方百计促动杜月笙去台湾,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还在上海召见杜月笙,要他去台湾。另据笔者浏览的一份原始电文,1949年2月1日,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来电,通过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要求滞留上海的著名银行家陈光甫、李铭和杜月笙赴台湾。从电文看,至少传递出三点信息,一是陈诚与他们素无来往,他的出面邀请,想必是蒋介石的授意;二是电文透露出的信息,陈诚曾几次三番地敦劝他们去台湾,语调威胁之意;三是杜月笙的地位已与陈光甫、李铭等大银行家平起平坐,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界领

袖人物了。面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的拉拢,杜月笙以不变应万变,虚与委蛇。

■ 争取杜月笙

为努力使面临解放的上海社会不乱,城市不遭受破坏,中共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影响杜月笙的选择,黄炎培、章士钊、盛丕华都带着使命与他进行接洽和试探。金山作为地下党员和杜的弟子的双重身份,无疑起了特殊的作用,做了许多工作。但因为地下工作的特点,留存下来的文献见证极少,笔者所见194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致函叶剑英、李克农,希望通过金山争取杜月笙的电报,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主要内容是:“望告金山,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所有船只、民航飞机、工厂、银行、公司、商店不受损失,不使南遣,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杜月笙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月笙这次主张通航,就是为人民办了一件有利的事。这一切,都可明告杜月笙,就是说叶参谋长(叶剑英时任中国人解放军参谋长,参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在北平的谈判)向金山说的。”

这份新发现的档案,可以佐证金山的确是受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指示进行地下活动的。可以想象,办事精干练的金山,对杜月笙的去向和态度必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9年4月27日,杜月笙拒绝蒋介石的再三拉拢,悄悄地坐船逃往香港,后来又在香港多次与中共人员联系接洽,表示“在尽可能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关照上海的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报效国家。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病逝后,上海有关报纸刊登了讣告,这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不同寻常的信号。(邢建榕)

(摘自《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红色记忆》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4年6月版)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16. 没有看到丝毫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韦尔斯回忆说,戈林远比其他的德国官员说话更坦率清晰,但表达的意思如出一辙。他怀疑希特勒会相信“除了军事的胜利,还会有其他的途径来摧毁英国人摧毁德国的意愿”。他提醒韦尔斯,这与上次的战争不同,德国已经“胜券在握”。稍后,戈林带韦尔斯参观了庄园,那里满藏着多年来掠夺的战利品。墙上挂满数百幅各种各样的绘画,玻璃柜展示着各国政府和渴望元帅恩宠的德国组织送的礼品。韦尔斯对戈林的庸俗颇为反感,因他的言谈感到及其沮丧。暮色笼罩,在返回柏林漫长的归途中,韦尔斯看见排着长队的柏林人,他们要么在等待购买食品,要么是电影院的门票。但他没有见到一张笑脸。

当晚,韦尔斯在灯火管制的黑暗中前往安哈尔特火车站。他的柏林之行成了虎头蛇尾。会晤中没有看到丝毫实现和平的可能性。与他接触的每一个德国官方对话者都背诵复述的是他越来越熟悉的回顾历史的套话,并且把所有的责任推给英国和美国。此外,他与在柏林的外交官们的交谈表明,德国国内反对希特勒的力量微乎其微。华盛顿曾寄希望于军队来推翻希特勒,这种想法看来是天真的。事实上,所有的权力都掌控于元首。而在所有会晤中,韦尔斯本人也没有表现出是积极地寻求和平谈判的框架。参与所有重要会晤的德国翻译回忆说,韦尔斯表现出的“冷漠和矜持”难以打动希特勒开口讨论和平。

在火车站的黑暗中,韦尔斯与一名德国外交官进行了短暂交谈,韦尔斯显然正在思考他的使命的其他目标,包括预先阻止春季攻势,使意大利和德国的关系复杂化。他告诉德国人说,他期望能够不辱使命,如果欧洲能够在“接下来4-5周”保持安静的话。但即使是短期来看,韦尔斯的使命也未能阻碍希特勒的步伐。韦尔斯对柏林的访问没有阻止希特勒加快下次攻势的准备: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一周后,希特勒派遣里宾特洛甫去罗马,督促墨索里尼加快行动。领袖首次私下表示,在恰当时机,他

会率领意大利参战,与德国并肩战斗。

韦尔斯对此一无所知,他乘坐的火车在九点左右驶离了柏林。但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他能够猜测希特勒的意图。在他离开德国之际,德国外交部已经令人沮丧地向媒体公布了会晤的细节。希特勒曾告诉韦尔斯,媒体的报道称,根本不存在和平谈判的可能,战争必须进行到最后一刻,直到德国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说韦尔斯是带着问题来柏林的,那么,他已经获得了问题的答案。

韦尔斯乘坐的火车在夜色中向南朝瑞士急驶,他计划访问法国前在那里休息一下。临近海德堡,火车已经进入法国大炮射程,德国的工事隐约可见。在距瑞士边境50英里(约80公里)的地方,火车沿着银色的莱茵河东岸行驶,穿行在法国构筑的马克诺防线和德国构筑的齐格非防线之间。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大家看到了德军的战壕和大炮阵地。在河对面,有时仅一百码远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法国的工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特使事实上处于两个交战国之间,这一位置让他获得了观察谣传中的战争的绝佳角度。他的火车通过时,德军士兵和法军士兵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他们晾晒的衣物在风中飘飞。传令兵骑着摩托往返穿梭。老百姓在田野劳作,或者在葡萄园整理藤蔓。“没有听见一声枪响,也没有任何声音打破寂静”,杰伊·皮尔虎特·莫法特说,“这场战争的非真实性给我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怪异感觉。”

随韦尔斯出访的《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沃尔特·特罗安描述了他从车窗看到的景色。“士兵聚集在韦尔斯乘坐的火车通过的沿线多个要点,履行其前线警戒任务,在火车所通过的沿线,士兵们在修建铁路、钢筋混凝土的碉堡、要塞、战壕和其他防御工事,在列车通过时停下来干活观看火车,如同美国的铁路工人那样。清晨灼热的阳光把莱茵河上的薄雾驱散,干活的士兵只穿了汗衫,仿佛大萧条时期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雇佣的劳工一般。他们对战争或者敌人漠不关心……儿童四处嬉戏。三个男孩,都不到8岁,在石桥上摇晃着腿,观看搅拌机把混凝土倾倒在修建的碉堡里……”

17. 事情远比想象的严重

因为天敏让专程去宁波带信的伙计只告诉承德厂里有事,让他赶紧回来,到底啥事,那个伙计没说。其实,厂里发生的事情,除了天敏和厂里几个高层管理,职工并不知情。所以,承德那日伙计厂里发生了啥事,伙计说不上来。承德问他厂里是否在生产,伙计说在生产。承德不问了,他已经清楚,天敏专门派人来宁波让他回去,此事肯定非常麻烦。

事情远比承德想象的严重得多。“阿德,厂里现在的情况十分紧迫。依走后没几天,东洋人的洋火就开始降价,过了几天,瑞士洋火也跟着降价了。起初,他们洋火降价我没有太在意,这种情况在欧洲常有发生。哪里想到那家东洋火柴厂价格一降再降,现在已经降到了成本价,比阿拉的价格还低很多,他们这一降,迫使瑞士洋火也跟着降。他们降价不要紧,连累阿拉的自来火卖不出去,现在库房里已经堆满了东西,所以我觉得,东洋人这次降价,不光是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那么简单,他们想挤垮阿拉呢。”天敏急切说。

承德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他沉吟了片刻,对天敏说:“看来东洋人这次是来者不善啊,对这桩事体依咋看?”“现在麻烦挺大,如果阿拉也跟着东洋人降价,已经没啥赚头了,而且,同样的价格,阿拉的货销不动,东洋洋火和瑞士洋火到底是老牌子,上海人相信老牌子,阿拉的自来火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优势了。”天敏没有直接回答承德的问题,其实他无法回答承德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他这个搞技术的已经束手无策。

“阿德,开始我想东洋人降价时间不会长,于是我也搞过优惠价,但是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东洋人降价的势头有增无减,阿拉跟不住了。”天敏忧心忡忡,他呷了一口茶,继续说:“自来火再销不出去,阿拉就无法再生产了,资金没有了,咋办?”承德心里很乱,他已经感到东洋人这一手的恶毒。他隐约感到其中肯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承德想了一会儿,说:“天敏啊,现在厂里生产切切不可停止,工厂一停产,影响实

在太大了。依给我透个底,现在阿拉销售的自来火价格,能不能保住成本?”“保住成本是有的,还有些微利。”天敏说。

“那好,依派人加大销售力度,到一家一家烟纸店去推销,把货给人家送到店里,这样可以回笼一些头寸,要保证机器继续开动起来。至于下一步,让我再仔细想想,看看有没有啥好的办法。现在,阿拉最主要是要弄清爽东洋人为啥要挤兑阿拉?”承德觉得一时没有好计策,只好先做权宜之计,把生产维持一段时间再说。

“哦,这次我在乡下带来一个后生,叫默涵,我看这个后生活络,人品也好,我想把他安置在依这里,依看看能否先安排他跑街,搞销售,薪金定5块大洋一个月,好不好?”承德想到了默涵,顺便把默涵的事解决了。“好的,这件事我会做好的,他什么时候来?我给他安排。”“明天,明天我就叫他来找你。”承德说。

一连几天,承德睡不着觉,火柴厂的事让他太揪心了,他心里掠过一阵寒意:按照火柴厂现在样子,他的那笔贷款按时归还肯定无望,这意味着他投入30万银两的火柴厂要打水漂。他隐隐感到,东洋人给他制造麻烦后面的黑手,这个黑手一定是东洋汇株式会社的大岛田。东洋火柴厂是东洋汇株式会社属下的工厂,这件事肯定是大岛田设置的圈套,他的目的是挤垮自己的火柴厂。只要到时候还不上英吉利银行那笔贷款,承德的火柴厂就完了。

一个月下来,申甫火柴厂上门销售效果不太明显。不过,比起之前,销售量还是上去了五成。眼瞅着库房里堆积的火柴,承德急得心急火燎。再这样下去,库房已经堆不过去了,要命的是,这样回笼的资金,已经无法保证工厂继续开工,更遑论归还贷款了。咋办?默涵到上海3个月了。这3个月,对默涵来说一切都是新的,好奇的。天敏让他担任跑街先生,这一阵子,他了解了上海很多事体。上海这个地方到底是码头,与宁波不一样,他了解了一家那么小的烟纸店,居然可以让一家人靠它生活,所以,他认为,在上海这个地方,如果有本事,到处都可以赚到钞票。

宁波商人



徐志明